

【编者按】谈到新疆近代历史人物，当然离不开曾经主政新疆的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三人，对于这三位人物的传记、评论及研究文献，已有多部著作或研究论文发表。但是对清朝时期派驻新疆的官员，在出版物中很少读到。自18世纪中叶清代平定南北疆之后，在辛亥革命前清朝统治新疆约一个半世纪，派驻新疆的大小官吏和军人不可胜数。但是今天人们有点印象的，不过林则徐、左宗棠、刘锦棠等寥寥数人，这一个半世纪新疆社会经济历史，留给读者的却是大量空白，十分令人感到遗憾，也使今天中国各族民众都很难在头脑里构建起生动丰富的新疆社会史。

《通讯》编辑部收到新疆政府参事室杜雪巍先生投来的三篇人物传记和一篇有关新疆建省的论文，觉得晚清和民初的这几个历史人物虽然在学术界受到关注不多，但他们也是研究新疆近代史时不应被忽略的，而且相关资料查找不易，考虑到以上几点，这几篇编入本期《通讯》。文中一些陈述引用清朝官方文书，代表的是清政府政治立场及叙事话语，仅供大家参考。（马戎）

【人物传记】

陶模：革故鼎新

杜雪巍¹

光绪十七年（1891年）12月初七日，北风呼啸、大雪纷飞。这一天，陶模冒雪抵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正式接替魏光焘就任第三任甘肃新疆巡抚一职²。

光绪六年（1880年）4月至光绪七年（1881年）9月，刘锦棠收复迪化，新疆尚未建省前，经左宗棠推荐，陶模曾任过迪化直隶州知州一职。十年后，陶模再次赴新疆，已是权倾一时的新疆巡抚。遗憾的是，陶模抵达新疆时已是冰天雪地，新疆的诸多变化早已为大雪所覆盖。

光绪二十六年（1891年）4月，关内已是春暖花开的季节，陶模离开西安，途径河南、山东到天津去京城述职，而后再由天津、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再赴新疆上任。期间，陶模携儿子陶葆廉，从东到西横跨一万一千二百三十三里，历时8个月终于抵达新疆迪化，此时已是冰天雪地。在他们行进到距离迪化还有七里地的地方，乡民们摆着茶、果，燃放鞭炮迎接他们。当他们前行到迪化南梁时，列队欢迎的抚标将士早已等候在那里。当抚标陪着他们的车子到达迪化南关时，护理巡抚魏光焘、藩台饶应祺、镇迪道兼按察使周崇傅等以及来迪化办事的吐鲁番王马木特等人均在那里等待着他的到来。³

一、以民为本，“治行合一”

陶模（1835-1902），字方之，又字子方，浙江秀水（今嘉兴）人。陶模祖籍江西浔阳，先世以武职从汴京（今河南开封）跟随宋高宗南渡，屯守秀洲（今嘉兴）。此后，他们便定居在嘉兴北郊的金桥。宋灭亡以后，他们迁居到嘉兴郊区的王江泾。陶模自幼家贫，他一边读书一边操持家务，把母亲纺织的丝绸拿到集市上去卖，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清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起义军攻占了嘉兴。陶模25岁时，曾一度被太平天国起义军掳去从事杂役。

陶模早年刻苦读书，有关各种诸子百家的书无所不看。那时古时的文宗桐城学派⁴向来不喜

¹ 作者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参事室（文史馆）《新疆文史》执行副主编。

² 陶葆廉著（西北行纪丛书）《辛卯侍行纪》，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419页。

³ 陶葆廉著（西北行纪丛书）《辛卯侍行纪》，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419页。

⁴ 桐城学派：以方以智为首的桐城方氏学派，是明末清初与浙江学派等齐名的一个重要学派，作为明末清初代精神的一个重要侧面，这个学派坚持的学术研究价值的取向（提倡易学与科学相结合、哲学与科学相促进、中学与西学相会通、考据学与义理学兼用、实学与玄学兼顾），对我们今天探讨传统文化如何现代化有极大的启示，值

欢八股文章，陶模认为“祸乱之基由于人心不正，空言文章”¹。那时，陶模便立志用治世之道来救国。入仕后，陶模专心于实际事务，以清廉和干练而知名。

地处甘肃最南端与陕西、四川交界的文县，位于秦巴山区，素有“陇上江南”有甘肃的“西双版纳”之称。文县在万山环抱之中，地势险峻。陶模在任文县知县时，“县在万山中险而瘠，模俭约自力，革朘削之政，宿狱剔奸，蠹有巨盗，屡捕不得，模掩得其家人以致之使求盗自赎。”²陶模拘其家人，逼其自首，且辅之以义学教化的办法，日子一长其自己便浮现出来了。陶模这种擒贼擒其心的做法，为当地人所称道。文县因地势偏僻，“俗信鬼，相传有猫神者，奉祀若狂”³。陶模焚毁了猫神像，指斥其为巫术。然后在当地设立义学数十处，教化愚民。“以轨于正，数月之后，循声大作，”⁴此后不久，人们便可以听到四处传来的读书声。“十二年夏，调补皋兰县知县”⁵。皋兰即如今的兰州市，是省府的所在地。当时河湟事变尚未剿灭，来往大军络绎不绝。县府时常被络绎不绝调动的兵士的后勤供应问题，弄得疲惫不堪。匪首闵殿臣叛乱后，河州镇总兵沈玉遂、提督张仲春所率湘、楚各军，不战而败，导致宁河被围，省城为之震惊。文武、官员皆聚于总督衙门府，商议解救宁河的办法。左宗棠号令大家镇静，然后紧急徵调援兵来援，责令陶模负责车、马、粮、草等后勤供应事宜，万分火急。陶模夜以继日，多方筹措，勉强完成诸事。在来往兵勇的调动中，混乱时时常发生兵勇们损毁县城老百姓的房屋用以取暖的问题，百姓皆多怨恨官兵的这种害民行为。陶模则答应百姓，所有损坏的财物借由官府来赔偿，不必聚众喧哗，这样才使省城的秩序逐步安定下来。左宗棠亦曾多次向人称赞陶模，谓其贤能。

光绪元年（1875年），甘肃“初分乡闱”⁶，这是甘肃设省以来的首次乡试。以前甘肃以西的士子们参加乡试，往往要赶到千里之外的西安。兰州设立乡闱，给参加乡闱的士子们提供了极大方便。然而要开办乡试，从选择地点，到建造房屋，直到考试结束，其间事务繁杂，均需要陶模事必躬亲。且丝毫没有出现各种扰民之事，包括采买器物，全部都是真金白银。那些与官府打过交道的商人们皆能感觉到官府对普通百姓的关照与体恤。尤其是在兵荒马乱四处皆是流民，田赋是一落千丈之时。虽然随着局势逐步安定，赋税也有所增加，但还是远远赶不上过去。“府君不畏强御，营弁恣横者，大官仆从滋事者，惩艾之弗从。”⁷

光绪元年（1875年）的冬天，陶模调补秦州直隶州知州。秦州原本是陇南的一个肥沃地区，但因陕甘地区连年大旱，导致秦州等地自光绪元年以来连年欠收，饥民流徙各地。逃往秦州的饥民就有数十万人。陶模甫一上任，面对此种惨景，便主动拿出他积累的俸金以及还有四万多元公款，在秦州开设了十余处粥厂。他鼓励那些有钱人家主动参与赈济灾民。此外，陶模修建了养济院，增加义田以抚恤鳏寡孤儿，以救济灾民。安定灾民后，陶模还捐出自己的养廉银在秦州以南兴修水利，筑堤浚池，筑堤三百五十丈，地势低洼处修城蓄水的池子，并在池边堤上广栽十余万株树木。夏秋时节，这些树木浓荫蔽日，俨然成了秦州人的游憩场所，众人皆称之为“陶公堤”。

陶模为官常以曾国藩的爱民为本思想来勉励自己，常以百姓的疾苦为念。陶模每巡行到村落，一定要骑马去看看。陶模告诫与他同行的人，切勿骚扰百姓。陶模的爱民之心，让秦州的百姓奔

得高度重视。“桐城文派”的流派特征，是以教师为主体的作家群。姚鼐所言的“天下之奇山水”，同时见证的除山水绮丽外，是地方农耕不能发达之状。农耕发展的困难，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桐城商业便不会走徽州之路，使“读书—科举—仕宦”之路成为必然。

¹ 马大正、阿拉腾奥其尔主编，《清代稀见奏牍汇编（同治、光绪、宣统朝卷）》中《清史馆列传》，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10月第1版，1955页。

² 马大正、阿拉腾奥其尔主编，《清代稀见奏牍汇编（同治、光绪、宣统朝卷）》中《清史馆列传》，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10月第1版，第1955页。

³ 陶葆廉口述、刘永亨撰，《陶勤肃行述》，第4页。

⁴ 陶葆廉口述、刘永亨撰，《陶勤肃行述》，第4页。

⁵ 陶葆廉口述、刘永亨撰，《陶勤肃行述》，第4页。

⁶ 陶葆廉口述、刘永亨撰，《陶勤肃行述》，第4页。

⁷ 陶葆廉口述、刘永亨撰，《陶勤肃行述》，第4页。



走相告，说陶模出生于浙江的富家，不然何以会廉洁、如此对待百姓。当地百姓皆倡议为陶模建立生祠，均被陶模所阻止。

光绪五年（1879年）六月，陶模调任甘州知府。甘州知府所辖一厅二县，陶模“籍口上官陋规，取偿于民”¹，摒弃陋规，一切从简。在任甘州知府时，陶模一次就豁免了各县按例应供奉的钱财。他每月仅得半分养廉银七十两，此外还得借二百两，才不至于入不敷出。就是如此，陶模仍捐资修缮了明伦堂、昭忠祠。为此，左宗棠奏请清廷，赞誉陶模“治行合一”²。

二、首赴新疆，百废待兴

正是因为陶模有着清正、廉洁的声誉，左宗棠才极力推荐他到大乱平定之后的新疆任职。光绪六年（1879年）四月，陶模到新疆任迪化州知州时，刘锦棠率领的清军才从阿古柏侵略军手中把新疆收复回来。当时新疆尚未建省，用千疮百孔、满目苍夷形容那时新疆恐不为过。

在左宗棠眼里，陶模自然是位能臣，好钢自然要用在刀刃上。新疆大乱初定，自然需要廉能、干练之人去开辟一个新局面。“光绪五年六月署甘州府知府所领厅县供府干，模悉罢之，贷金佐日用，新疆既复迪化直隶州缺官，宗棠疏言乱初定，当得贤牧令抚辑之。”³从以上记载看，陶模第一次到新疆任职的时间，应该是光绪七年（1880年）4月。陶模调任甘州知府不久，半年后，光绪六年（1879年）12月接到命令，其在甘州任上约十个月时间，即赴新疆上任了。在他任职的那段时间，正处于刘锦棠刚刚结束追剿阿古柏侵略军，收复迪化之后。当时迪化的各行各业均因为阿古柏的残酷统治而异常凋敝，社会秩序也在慢慢的恢复当中。

据史可知，刘锦棠率领的清军是光绪二年（1876年）7月（农历闰五月），抵达新疆的吉木萨尔与金顺会合，兵指阜康，逼近古牧地的阿古柏守军。7月30日，首先在乌鲁木齐地区的黄田向敌人发起进攻，打响了收复新疆的第一枪。也就是说，当时的乌鲁木齐是清军最先收复的一个地区。也就是在刘锦棠率军继续追剿阿古柏侵略军收复南疆时，对已收复地区成立善后机构组织民众恢复生产及社会秩序的时候，陕甘总督左宗棠便调陶模任职迪化任直隶州知州。

《新疆通志》记载，“迪化直隶州：乾隆二十五年（1760），清王朝在乌鲁木齐设同知；乾隆三十八年（1773）改同知为直隶州知州。”⁴从迪化直隶州的官府官员配置及其管辖的范围看，“知州一人，正五品。衙署内设理事通判一人，从七品；州学正一人，正八品；吏目一人，从九品；巡检一人，从九品。下辖：昌吉、绥来（今玛纳斯）、阜康三县。”⁵迪化直隶州管辖的范围不仅是迪化本身，还包括昌吉、阜康和玛纳斯三县，比现在的管辖范围大得多。

陶模在迪化直隶州任上前逾一年多时间，作为知州他需要做哪些事情呢？“清政府在府州设置同知和通判。州同知又称为知州；州通判又称为州判。同知与通判又分为两种，一种作为府州的辅佐官，分理府州内各项事务；另一种不作为府州的辅佐官，而专管地方某项事务，均冠以其分管专职的名称。新疆建省之前，清政府知府、知州之下根据需要设置有抚民同知、理事同知、管粮事抚民同知、粮饷同知、理事通判等职。”¹也就是说，整个直隶州地区农业生产、商业及社会秩序的稳定等方面，均是他的职责。当时因为战火刚刚平息，大战初定，城垣被毁，土地荒芜，商业凋敝，哀鸿遍野。急需尽快恢复迪化城各方面的社会生活秩序。可当时因为战乱，人们四处逃散，流离失所，大片土地荒芜，无人耕种。

¹ 陶葆廉口述、刘永亨撰，《陶勤肃行述》，第5页。

² 马大正、阿拉腾奥其尔主编，《清代稀见奏牍汇编（同治、光绪、宣统朝卷）》中《清史馆列传》，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10月第1版，第195页。

³ 陶葆廉口述、刘永亨撰：《陶勤肃行述》，第5页。

⁴ 《新疆通志》第15卷政务志·政府，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194页。

⁵ 《新疆通志》第15卷政务志·政府，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194页。



以前清政府任命迪化知州的官员均是满族人，自陶模上任后便改为汉族官员就任。时值四月，地上积雪尚未完全消融。陶模上任后，早晚均行走在冰天雪地里，安置屯户，不敢稍有懈怠。其组织军民另外修筑了乌鲁木齐满城，重新建立起祠堂，办公场所。陶模记载说：“在北庭两载，百废俱举，以修城劳。”²陶模此处所说的“北庭”，应该还是指乌鲁木齐，不可能是今天的吉木萨尔县城，唐代时的北庭故城。陶模此处借指塞外边城。为此，清廷给陶模增加了监运使的头衔。当时新疆尚处于回乱后的恢复时期，乌鲁木齐几乎看不到满族官员，就连汉人也百不存一。当时迪化城乡记载有汉民一千九百余家，每家只有一二人，大多是陕西、甘肃、湖南、湖北、安四川一带人。他们大多是兵勇退役下来从事生产、或从事手工业的。当时迪化城乡有回民一千七百余家，均是陕甘一带的人，其间还混有南疆一带的维吾尔头人，均据有土地从事耕种。整个汉、回民众加起来，也不过一千五百余户，男多女少。当时迪化重新对人口进行登记造册，一人便上报为一户，或二、三人上报四、五户，占地达百亩，甚至数百亩。但真正从事生产的人尚不到三分之一。“累易其处，鲁莽灭裂。岁歉则弃而之他，岁丰则以麦易银还入塞。”³不断发生的变乱，使人们均没有在新疆长期居住的打算。官府委派官吏重新丈量田亩时，且以新的文告公布法律时，民户大多逃离而去。陶模为了稳住这些民户，即打破过去的条条框框，采取变通的方式，告诉百姓：可以用二亩作为一亩；上等地以一亩纳粮八升，中等地纳粮五升半，下等地纳粮三升的办法征收；并暂且以六成来征收。

陶模调低农业赋税的措施是“一易再议之义，令民以二亩当一亩定赋，则上地亩八升、中五升、五合下三升，征其六缓其四。”⁴就是每认耕二亩土地折合一亩计税；上地每亩交粮八升，中地每亩交粮五升，下地每亩交粮三升；而且按应交农业税粮总额的百分之六十计征，同时规定六年内不调整征收比例，这样一来，认耕十亩最好的土地，最多交粮二斗四升，按百分之六十打折后，仅占收获量的百分之三以下。

“宗棠采其议，边民始有人久居志迁筑乌鲁木齐满城。”⁵这样的政策施行两年左右，效果就显现出来了。“方回迪化，驻防满军无子遗，汉民百不存一。模到州抚民，来商贾安置屯户和辑汉回军民。居二年，汉民得一千九百余户，回民得一千七百余户。其受地而耕者，汉回都一千五百余户，户占地百亩至数百亩，耕者三分之一。”⁶陶模不但鼓励农民开垦荒地，还给他们提供农具、种子、耕牛、房屋等辅助设施，并鼓励那些被裁撤下来的士兵们在新疆安家落户。

迪化州原来没有实行这一政策之前，约有三分二的土地还没有人耕种，实行这一制度后，因为土地有利可图，不仅留住了被遣散的军人，而且没有耕种的土地也都种上了粮食。这些人又都很快适应了下來，由暂留到长期从事开发边疆，成为屯垦的戍边一支重要力量

其次，在当初收复新疆时，因朝廷没有钱，“经费无措，左宗棠所请筹借华商银一百七十五万两，洋商银一百七十五万两，共三百五十万两，指定江苏、浙江、湖北、福建五省应协甘饷项下并本息各银，摊作六年十二期齐还清款。”⁷在迪化平定后，当地还是要承担分摊下来的贷款利息的。截止到光绪十四年（1879年）8月22日，“据称光绪四年分西征军饷，各省关欠解银一百

¹ 《新疆通志》第15卷政务志·政府，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532页。

² 陶葆廉口述、刘永亨撰：《陶勤肃行述》，第6页。

³ 陶葆廉口述、刘永亨撰：《陶勤肃行述》，第6页。

⁴ 马大正、阿拉腾奥其尔主编，《清代稀见奏牍汇编（同治、光绪、宣统朝卷）》中《清史馆列传》，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10月第1版1955页。

⁵ 马大正、阿拉腾奥其尔主编，《清代稀见奏牍汇编（同治、光绪、宣统朝卷）》中《清史馆列传》，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10月第1版1955页。

⁶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光绪卷宣统卷》十二卷，新疆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133页。

⁷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光绪卷宣统卷》十二卷，新疆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152页。



九十多万两致应调之军，应办之事，均以饷银惟艰，无从筹措等语。”¹ 朝廷非但没有钱来支持收复新疆的战争，反而连士兵的军饷还欠着。而古往今来，凡战争打的就是军饷、打的就是粮饷！在刘锦棠请求回乡治病疗养离开新疆之前，为免得跟随自己出生入死将士的怨气，竟把历年所有积欠湘军的四万两军饷一次发了下去，而自己却两手空空回到了家乡。

为了减轻朝廷欠饷的压力，战争结束后，清廷便命令左宗棠、刘锦棠压缩部队规模，裁撤部队人员。

而当时被逐步裁减的军人多来自陕西、甘肃、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四川都是一些农家青壮子弟。当时新疆生存环境条件艰苦，他们大都不愿意留在新疆安家定居，而返回家乡又没有路费，他们人心不定无意参加新疆的生产建设。都在等待观望，这也成为当时社会极不稳定的一个社会因素。

陶模的鼓励人们开垦荒地，自食其力的办法稳住了那些被裁撤，又不愿意返回内地的士兵们的心。农业是根本，陶模所做的便是这些开创性的基础性工作，为后来者奠定了一个好的发展基础。

光绪七年（1801年）九月，陶模被擢拔为宁夏府知府。次年秋天，陶模返回甘肃省城赴任。

三. 宦历直隶，回任陕甘

陶模返回甘肃省城兰州时，又赶上甘肃省举办乡试，所以陶模

未及到宁夏上任，便被抽去任命为乡试的监试。光绪九年（1803年）正月，乡试结束后，陶模便署理了兰州知府的事务。一个月后，陶模即被提拔为兰州道。

依照之前的定例，担任兰州道的官员，往往还兼管着兰州的茶务。而今兰州道新官上任，茶务的规则自然也要随之变更。无论茶商们过去积压了多少新票均需要更换。兰州的官、吏也正是因此得到了不少的好处。陶模念及茶商们日益窘迫的生活，加之他还兼着全省来往商人们的“厘金”（附加税之一种）差事。按说这是一笔很大的收入，但陶模顾及商人们的不易，皆全部取消了这些收费，且不能因为一个人的更换而随意改变。“曰恐病官，即以病商也。”²

陶模初到任时，尚居无定所。他也担心携家带口的拖累，且顾虑沾染上官场的习气，所以在外为官十二年，始终是孑然一身。后来，陶模的兄长前来兰州探望他，看到陶模的处境，竟唏嘘不已。

光绪十年（1884年）一月，陶模升任甘肃按察使一职。次年九月，陶模又迁任了直隶按察使。陶模的兄长，终以水土不服而病倒了，后病情加剧，竟在这一年的十二月病逝于兰州的皇华馆，陶模悲伤不已。

光绪十二年（1886年）三月，陶模入都觐见。行至天津，陶模随醇贤亲王一起观看了阅兵仪式。五月初二日，陶模接到了直隶府按察使的印信，即行上任。

燕赵之地，民风剽悍。各种刑事案件，异常繁多，较其他省份要多出数倍。“府君综覆名实，乃益急于他人”³。这一时期，陶模的家人非常挂念陶模的身体，让儿子葆廉从水路赶往直隶府，随侍在陶模身边，当时陶模已经51岁了。直隶府在今天的保定府，直隶府的藩库支出已入不敷出，但官员们的各种津贴却都很优厚。布政使松椿对于裁撤官员的部分津贴，面露难色，陶模便率先从按察使衙门裁撤开始，以响应裁撤之动议。

光绪十四年（1888年）三月，陶模迁任陕西布政使一职。五月，陶模入都觐见，请假休息一个月，回去扫墓。得准后，六月，陶模由儿子葆廉陪同，乘船南下浙江嘉兴秀水（今嘉兴）。

¹ 陶葆廉著，《西北行纪丛书》《辛卯侍行纪》，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419页。

² 陶葆廉口述、刘永亨撰：《陶勤肃行述》，第6页。

³ 陶葆廉口述、刘永亨撰：《陶勤肃行述》，第7页。



当时，陶模的家属皆住在盛泽。陶模在盛泽小住后，又去安不里探望亲戚、朋友。期间经过他小时候曾任教官的地方，睹物思人，顿觉伤感，感觉岁月的残忍。回到家里，经家人一再恳求，陶模仍不愿携家带口赴任所。但是儿子葆廉，坚持要随侍父亲，陶模也只得应允。

假期很快就满了，陶模带着儿子葆廉乘船到达汉口，取道襄樊，再到商洛。十月初旬，才抵达长安，即护理陕西巡抚。十一月，陶模接任陕西布政使一职。光绪十六年（1890年）正月，陶模升任陕西巡抚。闰二月，迁回陕西布政使一职。

陶模赴任后，巡视了南孝、义宁、陕江口等处。这一带的山体滑坡、水土流失非常严重。陶模谘询了很多的治河权威人士，确定了一些补救措施。因黄河向西决口从洛水汇入渭水，陶模组织民众，筑起数道堤坝，迫使河流向东流去。而华山之下的沟渠，大多因河水中的泥沙堆积，将河坝水位抬高，雨水以来，漫出的洪水便把两岸的田地淹没、冲毁。华州、华阴的驿站皆因为坝水泥沙慢慢堆高，夏秋时节，形成水患，淹没大批良田，道路不通。

疏浚河道淤泥、加高沟渠两岸的堤坝，成为陶模上任以来的首要任务。而且要求，上游、中游、下游通力合作。共同治理方能小时出效果。商州、丹水乃商贾必经之孔道，但山体滑坡积，岩石奔流，险滩相望阻挡了道路。下属知州李素等开凿修通了驿路三千五百余丈，陶模也捐出银两以进行倡议。此后，陶模“会典馆，咨取舆图”¹。他与沿线的各个县令商议，力求一起来修建。陶模将规划统一的示意图悬挂在办公室里，订立了简明扼要的工程章程，汇及多人的聪明才智，“讲求测绘学，刊书制器，及膳修仆马等用，皆捐资经理”²。陕西举办乡闹，按照过去的定例，士子们均不可以用来派差的，陶模也将陶模动员了起来。各种杂物，有一半皆是商人们供应的，名曰：支差！陶模为筹化钱粮，节省开支是想尽了办法。

陶模“提倡士林，研究实学；士子有留意当世之务。”³他还广纳善言，多方奖掖注重实用之学的学人。重新修建了陕西的著名大儒冯恭的公祠。陶模还将那些经世致用之才列入祀典，以正学风。这样也可给整个陕西人带来一个新的风气。

光绪十六年（1890年）十二月，陶模以“筹解新疆饷议叙”⁴赏给头品顶戴。光绪十七年（1891年）二月，诏授甘肃新疆巡抚，再次赴新疆任职。

四月，遵旨入京觐见。六月十三日，觐见。然后，出京，赴新疆上任。

四、再赴新疆，外争主权

光绪十七年（1891年）十二月初七日，陶模父子抵达新疆省府迪化。陶模抵达迪化巡抚衙门的第三天，便接到喀什噶尔道李宗宾禀报：英国北印度格里格提副将刁勒率兵伐坎巨提。⁵陶模二次赴新一上任，便被推到了处理清廷与英、俄领土争端的风口浪尖。

帕米尔在我国古代历史文献中，皆称“葱岭”，自汉代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汉、唐时中央王朝便在这里设兵驻守。清朝统一新疆后，进一步也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统治，“委任官员，设置卡伦，派兵巡查，完全处于中国的管辖之下。”⁶帕米尔地区位于亚欧大陆的中部，天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兴都库什山等世界著名的高山在这里汇集，素有“世界屋脊”之称。这里海拔均在4000米以上，虽然自然条件极其恶劣，但却是进出亚欧大陆的一个重要通道，战略位置非常重要。进入近代以来，这里边成了英、俄列强竞相角逐的重要场所。

¹ 陶葆廉口述、刘永亨撰：《陶勤肃行述》，第8页。

² 陶葆廉口述、刘永亨撰：《陶勤肃行述》，第8页。

³ 陶葆廉口述、刘永亨撰：《陶勤肃行述》，第8页。

⁴ 陶葆廉口述、刘永亨撰：《陶勤肃行述》，第8页。

⁵ 陶葆廉著（西北行纪丛书）《辛卯侍行纪》，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419页。

⁶ 苗普生、田卫疆主编，《新疆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382页。



《清史列传》中说，“新疆西边迤北邻俄罗斯迤南接印度属英吉利，当葱岭西有地曰帕米尔，乾隆间为我军锋所及。高宗尝勒铭焉。葱岭东南有小部落曰坎巨提，岁纳贡与我。模未至新疆，俄兵侵帕米尔，谋通印度英攻破坎巨提。”¹

“乾隆二十四年（1685年），将军富德穷追回首，一至其地，立碑以清、汉、回三种文字，勒御制文焉。”²但这三种文字皆称帕米尔地区为叶什勒库尔，并未明确说是“帕米尔”三字。帕米尔亦称大帕（米尔）、小帕（米尔），总计有八帕。在各种图、文记录中，均没有记载。此处几十个山间石田，也仅是布鲁特蒙古人用以游牧，并不常在此居住。自嘉庆、道光年间以来，新疆的各个官吏也未曾顾及此地。回来这个御制碑竟然消失了，咸丰、同治年以后，哈萨克右中各部再次游牧，沙俄竟然拿出他们自己绘制的所谓地图，说此地是沙俄的领土。葱岭东南是坎巨提，是乾竺特其的都城，曰：棍杂，在莎车以南，与哪格尔隔水相望。此处虽然与莎车相距二千里，但却一直与清廷保持着岁纳贡金一两五钱，后又纳贡给克什米尔。坎巨提居民贫穷且多强盗，其酋长也纵其民侵略邻部，受到英国人的责斥。光绪十四年（1887年），坎巨提竟私下与英国人订立协约，且英国人假借修路，才函告了我方政府。此处又与沙俄交通便利，其西北则通往帕米尔。光绪十六年（1889年），英国人请清廷拆分帕米尔以阻止沙俄侵入此境，遭到清廷拒绝。在陶模就任新疆巡抚之前的几个月，沙俄侵入了帕米尔地区。

19世纪70—80年代，沙俄在吞并中亚各国以后，就不断侵入帕米尔地区，企图翻过兴都库什山，直下南亚次大陆，寻找南到印度洋的出海口。而英国此时占领了印度，控制了巴基斯坦以后，企图进一步控制阿富汗，也进入帕米尔地区，希望遏制沙俄南下的势头。

从陶模给清政府的奏折中可以看出，当时清政府面临的困境，“中外方议战，模谓将士能戡土匪，未能击强敌，军中资百物必运自内地，数月乃达。俄英铁轨皆已至近塞，迅速通。殊新疆与俄境相接几五千余里，即增兵十倍不足以为固。俄若以轻兵出齐桑斯克，走布伦托海，犯镇西哈密”³。一旦发生战事，陶模还担心沙俄取道新疆北部，直插哈密切断清军与新疆南部的供给、交通联络。清政府对新疆的控制是鞭长莫及，国穷民弱，没有电报、电话，信息传递尚非常原始。但对于坎巨提边民，还需实施羁縻、安抚之策，为了不让他们向沙俄一方迁徙，还需要对其流民实施赈济。

陶模与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驻俄英使臣商议后，边界争议还未最后议定。光绪十八年（1892年），沙俄在这一地区修筑了堡垒让库尔及六尔阿乌，英国也唆使阿富汗派兵到了苏满波兹纳，这些都是帕米尔地区。当时，新疆“文武多湘人”⁴皆群情激奋，要求请战。陶模说：“属地当争，边要当守，新操法当习，兵寡不当，开备豫不虞，毋以小愤启大，寡有罪，当独任之规画，主客攻受形势，忍辱含垢，边地赖以安”⁵。五月，陶模上奏清廷，废黜坎巨提以前的酋长赛必德艾里，知会英国人和克什米尔人，新立了赛必德艾里的弟买买提艾孜木为酋长，令其镇抚部民。沙俄在帕米尔地区的居心叵测，处在几千里之外的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当然是始终不明就里的。当然，对于清廷当时所处的国际、国内形势，陶模还是看得非常清楚的。纷争迭起时，清廷将士尽管义愤填膺，纷纷请战。但怎么打？拿什么打？清廷的后勤补给远在几千里之外，全赖内地的供给。而敌方的铁路线就修到了边境线的要塞边上，战略物资指日可达，双方的实力相差太大了。所以陶模只能寄希望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俄方使节好好商谈，断不能承认俄方单方

¹ 马大正、阿拉腾奥其尔主编《清代稀见奏牍汇编（同治、光绪、宣统朝卷）》中《清史馆列传》，新疆人民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10月第1版，1956页。

² 陶葆廉口述、刘永亨撰：《陶勤肃行述》，第9页。

³ 马大正、阿拉腾奥其尔主编，《清代稀见奏牍汇编（同治、光绪、宣统朝卷）》中《清史馆列传》，新疆人民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10月第1版，1956页。

⁴ 陶葆廉口述、刘永亨撰：《陶勤肃行述》，第11页。

⁵ 马大正、阿拉腾奥其尔主编，《清代稀见奏牍汇编（同治、光绪、宣统朝卷）》中《清史馆列传》，新疆人民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10月第1版，1956页。



面侵占的新疆领土。陶模认为“俄得帕地，损我轻而损英重；我得帕地，增兵转餉岁费不支，疲我力以固英国，亦非胜算；议作为三国既促各不占据，英人以为然；俄独不愿。于是陈兵相持，累岁不解。”¹就因为清廷、陶模等的一忍再忍、一让再让，沙俄强行占去了中国帕米尔萨雷阔勒岭以西地区约七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所有国家的大小祸乱，都是有着内部人与外部人相互勾结酿成的。陶模认为“小不忍则乱大谋”。对于边地坎巨提来说，只要还像过去那样纳贡称臣，也就算事件得以平息了。

就因为国贫积弱，作为边疆地区的官员也难以直起腰来。正是因为帕米尔地区领土问题上的处理失误，致使沙俄强行占去我方七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光绪十八十一月十七日（1893年），陶模在写给清廷的《自请罢斥折》中说，“臣一介书生，毫无知识，上年春蒙恩擢受甘肃新疆巡抚，当时即拟疏辞，继思边陲寒苦之区，辞而不往，迹近规避，遂忘其固陋，冒昧出关，甫经履新，即有英人入坎巨提之事，旋有俄人占帕米尔之事。经臣先后奏明立咨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法理论，坎巨提遂更立新酋，俄人迄未就范。明年能否无事，正不可必。新疆文武员弁儉谓俄兵之来，由臣平日无威望所致，若前抚臣刘锦棠在任，断不致此。”²

刘锦棠首任巡抚的标杆就立在那里，让后任者陶模也感到肩上的压力巨大。陶模在自请罢斥的奏折中，接着说，“互相议论，众口同声，臣如果学识优长，人言何恤，而抚衷循省，实属力不任重、武不知兵，才不足以绥边，德不足以柔远。此时无以服众心，临事安能役众人，倘或贻误事机，臣虽委身锋镝，死有余辜，而重朝廷西顾之忧，即以擎天下全局之患，与其愆于事后，曷若筹于几先。伏恳皇上俯念新疆重地，断非微臣所能胜任。”³

清廷自然没有追究陶模的责任，也没有批准他的辞职请求。国弱无外交的道理谁都明白，陶模也没有替朝廷承担损失七万多平方公里土地的罪责。陶模在新疆南疆帕米尔地区损失的利益，却与伊犁将军长庚一起把新疆北疆的巴尔鲁克山争取了回来，这或许是他任上的一种将功抵过吧！

沙俄一方面在帕米尔地区蚕食中国的领土，另一方面在新疆的北部也是蠢蠢欲动。位于新疆塔城裕民县中南部，横贯东西的巴尔鲁克山脉，是裕民县的标志性山脉。巴尔鲁克山整个山脉呈中高山型，由于山体多次上升，构成明显的垂直分带。巴尔鲁克山北坡山峦起伏明显，降水丰富，灌木、草原型植被生长茂盛，是优良的夏牧场。如果把中国的版图喻为雄鸡，它就是鸡顶端向下弯曲的一片漂亮的羽翎。同治三年（1864年），沙俄依据《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以借牧名义强行占据了我国的巴尔鲁克山地区。

左宗棠、刘锦棠收复新疆南疆大片领土以后，对沙俄予以极大震慑。陶模咨请伊犁将军长庚，据理力争，及时收回了沙俄向我国借地放牧的巴尔鲁克山等地。沙俄本想耍赖，要求借期延长，以达到长期霸占的目的。但见中方态度坚决，一定要收回，沙俄只得将借牧的巴尔鲁克山地区交还给清政府。光绪二十年四月辛亥（1894年5月9日），伊犁将军长庚上奏清廷，“巴尔鲁克山皆山地，现与俄官会办，业将全山收还，迤邐边界择其要隘安设六卡，以卫边防。”⁴

五、架设电报线，推广汉语

与英、俄等国有帕米尔地区的领土争端，让陶模处理起来非常棘手。这也给了他莫大的刺

¹ 陶葆廉口述、刘永亨撰：《陶勤肃行述》，第11页。

² 马大正、阿拉腾奥其尔主编，《清代稀见奏牍汇编（同治、光绪、宣统朝卷）》，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10月第1版，1890页。

³ 马大正、阿拉腾奥其尔主编，《清代稀见奏牍汇编（同治、光绪、宣统朝卷）》，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10月第1版，1890页。

⁴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光绪卷宣统卷》十二卷，新疆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371页。



激，国弱被人欺。所以他励精图治，下定决心要让让自己的国家变得富强起来。所以从踏入仕途，陶模便对变法、革新的新思想感兴趣起来。

当初陶模在迪化直隶州采取的鼓励农民开荒种地的种种措施，十年后，迪化直隶州均发生了很大变化。周边的田地大多得到了开垦，商业也出现了日趋繁荣的景象。

在稳定局势的基础上，陶模很快就想到了办教育。因新疆毗邻俄罗斯，具有漫长的边境线，与俄人常为草场、牲畜越界办交涉、办商务，均找不到懂俄语的人才，是件令人头疼的事情。所以，陶模在1892年12月3日（光绪十八年十月），奏请“新疆设立俄文馆，酌拟章程，恳请立案。”¹以培养相应的俄语人才。

曾在新疆建省初期，左宗棠便建议刘锦棠在各地设立“义学”。“义学”又称私塾，多依靠官款、地方官款或私资设立的启蒙学堂。左宗棠说：“新疆戡定已久，而汉回彼此格格不入，官民隔阂，政令难施，一切教条均籍回目传宣雍弊特甚，将欲化彼俗殊俗同我华风，非分建义塾，令回童读书识字通晓语言可。”²刘锦棠基本接受了左宗棠的这些建议，在各地纷纷办起义学，初步构建起新疆最初的教育体系。

陶模在成立同文馆的基础上，又创办了少数民族学校。以前，新疆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只能上经文学堂，没有民族学校。陶模上任后，在新疆各地编设义学。当时师徒之间，语言交流全赖翻译。让维吾尔人了解汉字比较困难。“缠回素不学”³，很小便放牧牛、羊，跳荡、自嬉，不喜欢上学，下官若劝其子弟入学必须给其钱粮，且左邻右舍帮助其缴纳租税，才肯入学。这实际成了当差行为。数年后毕业，人们不问其功课如何，义学的老师也常常拘泥于过去的俗见。让维吾尔族小孩作起承转合的作文及试贴，每月报给官府的皆是义学老师自己完成的。且义学的老师多是湖南人，维吾尔小孩学习的均是湖南话，反而听不懂陕甘人说话。陶模责令相关部门，不能只用湖南人做老师，重新订立了义学章程，严格监督义学教授汉语、认识汉字，去除虚伪粉饰，以求实用，且导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孝悌、忠信，修身、敦行之道。

为了避免且减少中国人因不懂对方语言，在中俄通商不平等条约中形成中国商人不公平地位的局面，他奏请清廷免去了中国商人的厘金（附加税）。

自光绪七年（1872年），沙俄强借巴尔鲁克山游牧以后，沙俄商人往新疆贩卖洋货，依照条约便享受不征税的待遇。后来沙俄对新疆的贸易量日渐扩大，且沙俄驻新疆的领事也纵容那些不是洋商的哈萨克商人，即使他们售卖的不是洋货也都不向清政府纳税。当时，英国人尚未与新疆签订通商条约，但也比照俄商不向清廷纳税。陶模议收洋税，不能“独困吾民”⁴，于是奏请暂免新疆商民的厘金（附加税）。

当时“缠回文字横行”⁵，又因为语言不通，汉族官吏皆视这些人为异族。而这些人却远道而来，负债累累，即使救济也应接不暇。陶模体恤这些商人的生活艰辛，对于那些敢于贪墨的官吏，陶模当即予以弹劾、罢免。陶模平时会晤那些基层司牧，反复告诫百姓生活的艰难，一定要约束好自家子弟、仆从。而对翻译，也正告他们，切勿蒙骗那些与自己服装不一样、语言不一样的人。

新疆各州县改设郡县制以后，吏治却未见得比以前有所好转。维吾尔族的集市贸易是七天一次，他们不认识中国人的“年历”，也不知道中国人的“度、量、衡”。所以有些汉族人欺负他们

¹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光绪宣统卷》十二卷，新疆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358页。

² 《左宗棠全集》奏稿七，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第519页。

³ 陶葆廉口述、刘永亨撰：《陶勤肃行述》，第14页。

⁴ 陶葆廉口述、刘永亨撰：《陶勤肃行述》，第13页。

⁵ 陶葆廉口述、刘永亨撰：《陶勤肃行述》，第13页。



愚昧，给他们“重利放债”¹，于是造成他们“卖妻鬻子”²。于是，陶模严禁汉人对维吾尔族人放债，违者依照内地不得与土司交往借债的例子来严厉治罪。

光绪十八年十一月壬辰（1892年12月26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设新疆省城至喀什噶尔电线，以速边报。”³当时电报、电话已传到了中国，在内地已普遍架设了电报、电话线路。于是，陶模会商陕甘总督，开始在新疆南北疆架设电话、电报的线缆。电话、电报的开通，这使清廷不再用“六百里加急”靠马匹通过驿站来传递信息了。新疆也已经在往近代化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步。

随着电报、电话的开通，清举办洋务运动在武器更新制造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面对清军的落后装备与战法，陶模积极提倡学习德国的兵法，操练。陶模先从巡抚衙门着手，选择一百余人，学习文字、测算等方法，再推行到各营。陶模在平时见到将弁，必告之曰：“各国武官皆晓普通文字，故能谙兵法。公等年已长不及学，惟望习劳苦，爱枪械，仓猝有事，则挖小沟隐身，伏地发枪，或不至于遽奔。”⁴如此这般，陶模还是提升自身部队的素质及战斗力上多下功夫，免得战事一来，兵营措手不及。

光绪十八年十二月丙寅（1893年1月29日），“现在新疆筹办边防，须用新式过山快放炮三十七、四十七密里口径等各式数尊，各项新式洋枪一二千杆，著神机营王大臣、北洋大臣李鸿章酌量拨给，配齐弹药，行知甘肃新疆巡抚迎提应用，并著该大臣等遴派熟悉演放枪炮人等，随同前往。将此谕神机营，并谕令李鸿章。”⁵由此可见，清政府在“富国强兵”道路上也明白了一个道理，落后是要挨打的。单从这个方面来说，当时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已经是蔚然成风。

武器的更新当然是守卫边防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还要有懂得训练、战法的人才。光绪十八年（1893年），陶模由北洋武备学堂咨调教习守备张志文等武备学堂十余人来到新疆，并设立讲堂，训练兵勇。⁶这是一项创建性的工作，但在以往的史料记载中却忽视了这一点。

清廷来自外部的压力非常大，但是清的大臣们认为，自己已经是有很大进步了，老祖宗的章法已经被改变了不少。而对于那些睁眼看世界的人们，国家改革的步伐还是太慢了！

六. 建造兵房，普查矿产，完善建置

自刘锦棠亲率清军驱逐阿古柏匪帮出新疆之后，新疆的南、北疆各城十座有九座都是新筑的。建城者，还按过去的方法造城，皆是高高的城楼，容易遭炮火袭击。垛口之间部容易横着摆放器物，再有就是垛口的孔留的太小，不方便射击。于是，陶模在省城投入很大资金，在没有兵房的地方，即士兵在风雪中没有休憩之处补做兵房，共建有十五处兵房。在兵房中安置有炮孔，隐蔽起来。后来古城奇台修建县府时，就是按照陶模说的办法建造的。外人看起来，非常奇怪！但陶模知道这都是因为政府的财政困窘所致，所以不能按照欧洲炮台的那种砌法。

此后陶模派员在新疆全境，探求矿产资源。比如吉木萨的铁矿、喀喇沙尔（今焉耆）的铅矿、达坂城、温宿、拜城的铜矿，绥来（今玛纳斯县）、库尔喀喇乌苏噶斯山的金矿，迪化的石油均是那个时候普查出来的。

陶模在任上，在罗布淖尔以北修筑了蒲昌城，在南面设立了屯防局，组织回民前去开发、定

¹ 陶葆廉口述、刘永亨撰：《陶勤肃行述》，第13页。

² 陶葆廉口述、刘永亨撰：《陶勤肃行述》，第14页。

³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光绪卷宣统卷》十二卷，新疆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359页。

⁴ 陶葆廉口述、刘永亨撰：《陶勤肃行述》，第12页。

⁵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光绪卷宣统卷》十二卷，新疆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359页。

⁶ 王瑜玮文：《饶应祺主新台议》，载于中央民族大学硕士论文第17页。



居，进一步扩大了行政建制。

罗布淖尔在《汉书》中称为蒲昌海。唐代称其为纳缚波，转音而成了罗布泊。随着风沙的淤积，罗布泊日渐缩小。罗布泊的周围皆是荒沙戈壁，南北千余里，东西二千余里。自唐宋以来，这里便渺无人烟。此处从罗布泊的南北千余里、东西二千余里来看，这似乎是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同指一处，那怎么又专指罗布泊呢？从“以新疆中权，亘此荒碛。赴疏勒于阗，道益迂绕。”¹此出“荒碛”今天显然是指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陶模设想：从敦煌以西开辟一条捷径，来直通焉耆，然后再分路前进。他派员详细测量了这条道路，一边察矿一边测绘，一年时间完成。自新疆以南，青海、西藏以北，噶斯乌兰达布逊，阿耨达、托古兹、尼蟒依诸雪山的阴面迂回出入，在私人所记各类图志均没有记载。这片荒碛之地缺乏粮食，转运也极其艰难。机器设备难以进出，矿学难以通达。沿途经过，哪里一毛不长？哪里有水草可以放牧？哪里有土可以地耕种？均一一记载在案牍当中，给后任官员提供一个按图索骥的图本。前任署理巡抚魏光燾，经营罗布淖尔境内的屯垦事务。在西塔里木河的河滨，陶模设置了专门拓展其以南及东南的蒲昌还北，四百余里处，即《水经注》所说的龙城，陶模奏请设置了安置侨民的蒲昌，在距其一百四十里的卡克里克地方有一个很大的古城遗址。陶模奏请在卡克里克设置了屯防局，招徕无地的回民迁徙来此耕种。在此后接替陶模任新疆巡抚的饶应祺在此地，设置了新平等营县，就是得益于陶模之前的开拓性规划。

七、离开新疆，升任陕甘总督

光绪二十年（1895年）正月，清廷诏令各文武大员进京祝寿。此次的祝寿应该是给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过寿诞。陶模给陕甘总督杨昌濬发电报商议，以边防紧要，奏请延后去祝福。几个月后，陶模再次请求陕甘总督杨昌濬将董福祥调回新疆可充大用。陶模历来非常尊重武员，他评价董福祥说：“然非所语于悍鄙之人，今实少将才。此辈当今常受疆吏节制，砺其廉耻。”²上一年即光绪十九年（1894年），清政府对日本的侵略英勇抗击，董福祥也招募军队准备率部参战。董福祥新招募了十个营的兵勇，但军械缺乏，向陶模讨借。尽管新疆的军械也不多，但为了抵御外敌入侵，陶模咬牙将新疆的两千杆后膛新枪、六十余万发枪弹通过蒙古草地给董福祥送了过去。

最后董福祥新募的部队，枪械算齐备了，但又没有东出御敌。清政府对日本的作战也以失败便提前结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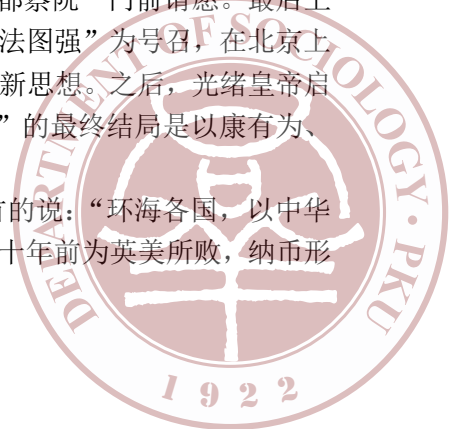
光绪十九年（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以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光绪二十年（1895年），中国被迫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须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给日本。这激起了全体中国人的强烈抗议。

光绪二十年（1895年）春，乙未科进士正在北平考完会试，等待发榜。《马关条约》内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白银二亿两的消息突然传至，在北京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台籍举人更是痛哭流涕。4月22日，康有为写成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帝帝书”，十八省举人响应，一千二百多人连署。5月2日，由康、梁二人带领，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集“都察院”门前请愿。最后上书被清政府拒绝，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之后，康有为等以“变法图强”为号召，在北京上海等地发行报纸，宣传维新思想。严复、谭嗣同亦在其他地方宣传维新思想。之后，光绪皇帝启用康有为等，这就是历史上的戊戌变法，也叫百日维新。“戊戌变法”的最终结局是以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海外，谭嗣同等六君子殉命而收场。

面对清政府的惨败及此后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陶模曾痛心疾首的说：“环海各国，以中华为鱼肉，皆由我之痼疾久中于腹心，而肢体之痿痹随之。彼日本于三十年前为英美所败，纳币形

¹ 陶葆廉口述、刘永亨撰：《陶勤肃行述》，第15页。

² 陶葆廉口述、刘永亨撰：《陶勤肃行述》，第16页。



成，因惧而奋，遂成强国。我诚能发奋自强，合群策群力，急起直追，何事不可勉为。若仍缚于成例，淆于浮议，不以全力赴之，虽勉行十之八九，亦无济于事。”¹

面对惨痛的现实，陶模一方面主张快速培养人才，另一方面主张改革清廷的军事人才的选拔，武器的更新，战法的更新。他主张在军事上改革兵法，学习德国的兵法以保护自己，消灭敌人。他在给清廷的《培养人才勉图补救折》中说，“臣愚以为国之强弱视人才为转移，人才不足不但和与战均无可恃。即幸而战胜亦无益于根本，自古用人文武并重，文有科目，武有营伍。立法之初，未尝不善，积久弊生，仕途日益杂，民生日益困，人才日益不可恃。臣窃伤之，夫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古今同慨。人才不养于平日，而欲招致临时，虽伊吕复生，无能为力。今日者创钜矣痛深矣。善于谋国者，不以胜而志满，不以败而气沮。艰难困苦之时，正圣主激励奋兴之时日。易曰：穷则变，变则通；天下事所当变通者不止一端，而人才尤其亟，非惩前毖后，破除一切拘牵之习惯，无以做天下之士气而收实效于将来。”²

在奏折当中，陶模建议清廷，停止捐官这一延续多年的积习，裁撤冗员，破除满八旗子弟的积习，禁止官员吸食鸦片，设立算学，艺学等教育课程，废除武科考试，改变练兵操法，水军、陆军、海军均要不拘一格选拔人才，选拔旧子弟游学各国，培植工艺等十三个方面阐述了他具体改革办法。

然而，陶模的建议归建议，现实生活中还必须正视现实。也就是在东北出现战事时，陕、甘一带亦谣言四起。河湟一带的回民，以京城、东北一带戒严趋势发动叛乱。这年冬天，河湟一带的回民因为新教、旧教的教义互相殴斗，进而合起来抗击官府。光绪二十一年（1896年）三月，青海、甘肃一带的撒拉族发生叛乱，包围了循化城。四、五月间，河州的叛匪闵伏英、马永林攻陷了汉民堡，接着进攻河州城。而西宁的逆匪韩文秀、刘四伏，大通的逆匪包良等则各拥众数万人，四处焚烧、杀人。巴燕戎格陆续击败了接连参与叛乱的匪徒。河州镇总兵汤彦和平素里便喜欢结交，欠下很多债务。其手下也不懂战事，便与叛匪谈判求和，然后袭击叛匪，亦没有最后出台堡。固原提督雷正綰到河州后，因兵少、枪械落后，被包围在河州城内。此时回匪叛乱的势头愈演愈烈。河州周边的回匪不断袭扰岷州、巩昌，而东边海城的叛匪则戕官劫狱，不断往河州聚集。

陶模鉴于甘肃、新疆唇齿相依的关系，遂调派提督苏贵兴等紧急赶往金城、湟郡，就地招募了三个营的兵勇，赶往巴燕戎格助战。陶模紧急电报给陕甘总督杨昌濬，奏请命令董福祥紧急往西帮助剿灭回民叛乱。六月，甘、清的平番局势逐步发生变化。勾结西宁的叛匪占据着岔口、武胜等城堡，进而袭扰古浪、山丹等地，捣毁电报线杆、烧毁驿站。于是，河西四郡与东部的电报、电话线路中断。甘州提督，肃州道以下都不断向新疆祈求援助。而陶模则通过沙俄境内的电报线路，与陕甘总督府取得联系。面对此种紧急状况，叛匪们的气焰也日渐嚣张起来。董福祥担心自己所率的各营兵力不够，况且其所部兵勇中的回民也不少。与其日见局势恶化，不如一鼓作气全力剿灭叛乱。于是，董福祥电请增派马心胜、牛师韩两军前来参战。七月，叛匪均集中龟缩到了大通县。逆回匪首私下商议，如果谋乱不成，便可以向过去的白彦虎一样，往新疆方向逃窜。西天地辽阔，非内地可比。“今饷道既断，人人危惧。镇抚辖境，亦非易易，况又兼顾邻封。”³陶模在极其困难的形势下，审时度势，殚心竭虑，仔细谋划。他以边电请伊犁将军、喀什提督及其他各道分南北两路抽调兵力镇守，一边命前古城营游击罗平安，以马步三营紧急驰援哈密；补用提督牛允诚以三旗驻守安西、玉门；总兵赵有正率四个营进驻肃州；几支部队，互为支援。陶模

¹ 马大正、阿拉腾奥其尔主编，《清代稀见奏牍汇编（同治、光绪、宣统朝卷）》，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1926 页。

² 马大正、阿拉腾奥其尔主编，《清代稀见奏牍汇编（同治、光绪、宣统朝卷）》，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1933 页。

³ 陶葆廉口述、刘永亨撰：《陶勤肃行述》，第 17 页。

派候补道潘效苏为东防营务处驻守哈密，就近与各位将领、官员商议，防守事宜。在各村庄，陶模下令储存够足够的粮食，坚壁清野。在戈壁沙漠的要道关口，则挖掘长沟、修筑端墙，阻击叛匪。从哈密伊吾到酒泉长达二千余里的通衢大道上，仅部署着十余营的清军的确有些勉强。

当时关内叛匪已派出多个党羽，前来新疆煽动回民叛乱。九月初四夜，绥来（今玛纳斯县）县城内回匪托昌纵火为乱，杀害了值班的哨弁。幸好城外有汉、回民团及时赶到，隔断了回匪的声援道路，得以分而歼之，扑灭了叛乱。陶模又急电总兵徐学功、游击焦生有等率马队驰往弹压。省城迪化的回民当时也积蓄力量，准备起事。陶模严令防范，从容镇定。其派出的密探侦知，回匪与衙役密谋，选派亲信戈什哈面授机宜。陶模悬重赏得以擒获杨进裁等六名匪首，然后严厉法办；协从的可以不予追究，人心遂很快得以平定。

十月初，甘州提标率马步两营，由山丹县东进，疏通了道路，直至水泉堡。他们遇到了千余名叛匪，战斗失利，新疆派出的弁勇林进福阵亡，水泉堡失陷。张掖也只剩下赵有正一支部队，刚抵肃州，属孤军深入。而甘州的文、武官员则屡次祈求增援，不得已陶模命令赵有正进驻甘州。然后陶模又通过沙俄的电报线，接通甘州提督张永清。张永清称永昌县城也亦被包围，兵勇损伤惨重，乞求增援。陶模立刻派赵有正率四个营前往增援。因为驿路阻断，新疆的摺报多从蒙古台站转走，经科布多等处接递。

十月二十一日，陶模接到甘州急电，拨营往援的谕旨。其实早在十月初四日，便有了任命陶模升任陕甘总督的谕旨，只是凉州的道路受阻，京城的电报未及时到达，而通过沙俄境内的电传才得知。如此一来，陶模以陕甘总督之命疏通饷道成了他的首要任务。而由其率领数营沿途剿灭各个叛匪也就更为顺手得力了。

光绪二十一年辛未（1895年11月20日）“以甘肃新疆巡抚陶模署陕甘总督，甘肃新疆布政使饶应祺署甘肃新疆巡抚。”¹，

陶模接到升任陕甘总督谕旨时，董福祥率部已渡过洮河，陕西巡抚魏光焘所率湘军也已渡过湟水。当时河西走廊东面的部队已经很多了，必然逼迫叛匪向西蜂拥而至。陶模判断：东路部队不必沿着嘉峪关大道西行，可以从北面的沙漠直接插到伊吾、巴里坤，自己则率部从驿路南行。陶模布置了迪化、镇西的防务之后，然后出发，移师到了甘肃境内。然后，陶模由安西、玉门向东进发。陶模是步步为营，谨慎而行，就是期望杜绝逆匪的后患。当陶模抵达甘肃肃州时，遭遇大批叛匪。陶模便命令甘、湘各军夹攻叛匪。战都开始不久，叛匪便分兵向南翻越过祁连山，由小路进攻大通县。陶模按照已经制定的计划，命令提督张怀玉、范知松，总兵叶三春、徐学功，参将江耀龙等带领马步数营，分守天山以北的迪化、镇西二郡，此乃核心二郡。而天山以南的哈密以东，东北的图古里克皆有通往肃州的小路。陶模遂电告哈密文、武，在这些小路的要道口，集中了一些当地有经验的猎人守在那里。凡是沙漠中又水草的小道，皆安排了哨兵、暗探。同时电告肃州镇总兵，在酒泉以北的毛目城王子庄各路口守望。如哈密得严防叛匪不得偷渡漠北成功。叛匪也有数支马队，出没在驿路以北，窥视着漠北一带的虚实。

陶模对所辖镇、抚、提、标各个队伍的属下进行严格盘查、筛选、整顿，将原来的部队进行撤、并，编成了新的马步八营作为自己的亲军。他亲自带领着亲军前行。然后，陶模调任潘效苏管理营务处，晋升焦大聚为吐鲁番游击，罗平安升任古城奇台游击，参将金兰益等为管带。各营檄调千余里，来往奔突。

十一月十七日，陶模交卸了新疆巡抚关防。十二月初四日启程从达坂城，过鄯善，涉沙漠，一路上几乎没有井水，甚至泉水。八个营梯次行进，水源极其匮乏。陶模的儿子陶葆廉行前，带了一些冰块，凿碎后，煮沸了饮用，味道咸苦而生涩。陶葆廉用棉絮裹着萝卜以备路上解渴，但都冻成了生铁一般，不能下咽。他们只能饮着既咸又苦的恶水，士兵们也大多生起病来。这时，

¹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清代新疆资料辑录》，新疆大学出版社。

陶模的气喘病也发作了，屡屡咳嗽。而每次下车，陶模均环视一遍兵士队伍，抚恤安慰士兵。行进时，陶模时常以电报探寻着前方的军情，好作出各种应对办法。八日，陶模行至吐鲁番。住在鄯善鲁克沁的回王玛木特，也赶到吐鲁番面见陶模。

光绪二十一年（1896年）岁末时，陶模一行抵达哈密。因陶模身患气喘疾病，在哈密调养了十日。休养间隙，陶模巡视了哈密的汉、回二城，巡视了哈密驻军以及率队途径哈密的军队训练，观看了他们的操练、射击、打靶，以及汉军与维吾尔士兵们的合操。从合操的情形看，汉、维吾尔两个民族的士兵间并无相互猜忌。在哈密期间，回王沙木胡索特倾城欢迎了总督陶模。

陶模在新疆任职期间，维护国家主权，抵御外敌均有贡献。他对于发展新疆交通，分道测绘地图，勘查各类矿产，积极准备开发、建设新疆付出了辛劳，无奈各种条件的限制，未能如愿。他还组织回民读书、学习汉语，进行民族交流，进一步缓和了民族关系。

在哈密停留期间，陶模布署了哈密这一新疆门户地区的防务之后，便率甘军行抵至甘肃河州。此时陶模所率领的军队约有三十个营，加之湘军在西宁集结的也有三十余营，东路大军在此云集，陶模准备同叛匪展开决战。而此时，从新疆赶来支援的赵有正部四个营，孤军深入，势单力孤。陶模多次电告赵有正会同甘州文、武，谨慎把守好隘口，防止叛匪逃窜。光绪二十二年（1897年）正月十四日，赵有正听从了部属标营一位将领的建议，贪功冒进，函约了进驻凉州的统带连胜军总兵刘璞，统带镇南营的易顺胜，各领兵马从祁连山的小路，进占了俄博营和永安营。但刘璞和易顺胜二部却没有能按照约定期限到达指定地点。赵有正孤军深入占据了俄博、永安二城，此二城距离甘州四百二十余里。赵有正部稍得喘息，便连夜乘胜进攻东面一百一十里地北面的大通营，在元宵节之夜抵达大通营城下。赵有正部的神速抵达，令叛匪措手不及，遂集中了约八千名匪徒包围了赵有正部。赵有正部击毙了两名叛匪头目，叛匪退回到城内，其前营副将魏其德也战死。赵有正部面对数倍于自己的叛匪，也且战且退，退回到永安城内。正月二十日，陶模赶到马莲井，立即电令刘璞和易顺胜迅速分兵增援赵有正部。永安城处深山之中，粮食缺乏，赵有正部不得已，退回到俄博营，等待援军到来。四天后，陶模抵达安西州。他闻听叛匪尾随而来，便命令都司陶廷相将所部马队分兵扼守要道。二月初二日，陶模进入嘉峪关。从肃州、高台到甘州、安西，陶模历经各城，一路整饬标营，激励部将、乡团，百姓则夹道相迎。当时，叛匪皆聚集在山南一带。由此，河西四郡得以恢复畅通，陶模也实现了他先前的承诺。

此后，陶模命令潘效苏督率所部亲军各营，由扁都口征剿聚集祁连山以南的叛匪。正当董福祥各军从湟郡进攻叛匪的同时，陶模也迅速进入了兰州城。

光绪二十二年（1897年）三月初七日，陶模接陕甘总督篆。陶模上任后，便紧急解决灾民的赈济事宜，及清军战后的粮饷问题。

自回逆叛乱以来，清廷采取的政策便是以抚为主、以剿为辅的原则。对于叛匪最后盘踞的据点的大通县，陶模也调整了以往以抚为主的政策。大通县偏居深山之中，地势险要，雪山对峙。自逆匪叛乱以来，从未经历过重创。大通县周围布置有十个庄堡，每个庄堡又各有小寨，均易守难攻。此地叛匪，屡屡破坏驿路，丝毫没有招抚悔改之意。三月初四日，潘效苏率所部与焦大聚部、金兰益部、易盛富部、赵有正部连续攻剿了约十日，连续攻克了大通县外围的十个庄堡及其周围的小寨，歼敌三千余人，击毙逃入山涧者也有数千人，斩杀叛匪头领八十余人，收复了大通县。而魏光焘率部征剿西宁三关的战役，反而是降者居多数。陶模判断：自大通县败退逃到西宁、青海的匪徒，最后只能是沿着多年前白彦虎的轨迹，往下降逃窜；自己依靠手中现有的兵力，足可完全剿灭叛匪。陶模派兵扼守河西四郡，拦截从南山到荒漠沙碛逃来的叛匪。这一带没有食物，饿死的逆匪一定不少；叛匪头目亦可束手就擒。其余的叛匪皆可以安置在罗布淖尔（今尉犁县境内）地区。

大通县战事结束后，陶模命潘效苏部及其他将领皆出山，陈兵与玉门以南的各个隘口。“若

宿兵绝漠，内地空虚，为祸更大，乃奏罢青海之师。”¹ 此时，四处逃窜的叛匪仍为数不少。叛匪号称有七、八万人，仍聚集在距兰州三千里外的与新疆毗邻的南部边界一带。新疆文、武官员及百姓闻听后莫不震惊、恐惧，新疆巡抚、伊犁将军也屡屡发报，告知情况危急。清廷原来是希望固原提督邓增率部出青海，与新疆会商，又令喀什噶尔道提督张俊赴北路防堵，实际上都属于鞭长莫及之策。

陶模说：“非至玉门、敦煌掠食，必不能遽犯新疆。”² 陶模建议军务处改变先前的决策，以邓增率部移驻肃州。而参与会剿叛乱的陕西巡抚魏光焘在湟郡频频以新疆告急，恳切责之。但提督董福祥与陕西巡抚魏光焘关系不睦，互生齟齬，相互攻讦，不能共事。陶模建议清廷免去魏光焘的剿匪之职，令其回任陕西，如此可以促成两全之策。四月中旬，陶模督派提标各营紧急驰往玉门县，南青头、昌马等处，待叛匪由青海的柴达木下来时，猛扑数次，均被罗平安、牛允诚所率各营击败。陶模然后檄调玉门的部队疾驰赶往安西州、南七工抱等处。五月初，大批叛匪逃窜于此，叛匪头目刘四伏欲夺路觅食被围。此时的叛匪人数已很少，尽管清军屡遭险境，但清军士兵拼死厮杀，顽强抵抗，突出险境。尤其是清军副将金兰益，每次厮杀，皆满身鲜血。清军最终战败叛匪，斩敌数千，收降了约五、六千人。“冻饿僵迹磧中者，数万人。”³ 刘四伏带领千余名叛乱残匪逃走。陶模遂电告险境巡抚饶应祺，在罗布淖尔设伏，以击杀刘四伏残部。然后陶模电饬金兰益部，昼夜兼程赶往，截杀由色尔腾海逃往罗布淖尔的叛匪残部。荒漠、流沙中到处都是饿斃倒地的叛匪。七月中旬，饶应祺回电称，刘四伏在罗布淖尔东南的和儿昂被擒，叛匪余部均在新疆塔里木河滨归降，官府授给他们土地，令其耕种。

由此，陶模令焦大聚部、罗平安部退兵，返回至甘州以南的牛头沟驻地。大战之后，陶模便命令各州府搜捕余匪，掩埋尸体，以消除疫情。九月，整个西北各省，甚至关内外同时宣告，陕甘叛匪已肃清。

八. 总督任上，殚精竭虑

回乱平定后，陶模视察了遭受战争洗劫过后的各个地方。陶模是在征剿、平定陕甘叛乱的过程中升任陕甘总督的，也深知战争带给地方，当地百姓造成的破坏作用。所以陶模就任后，便立刻整顿部队，裁撤掉那些多余的冗员，以减少当地百姓的负担。宁夏将军因为战乱，曾奏请新募了十个营的新军，战争结束后，陶模考虑宁夏可以保证不会发生战事遂决定裁撤掉这新募的十个营。所有这些善后事务，忙得陶模是焦头烂额。

十月初四日，清廷同意了陶模的撤兵裁饷奏议。但甘肃汉、回之间的矛盾如何消弭，是陶模非常头痛的一个问题。“甘肃民多嗜食洋烟，平居陵回民，回民顾坚忍能合群，激过甚辄生事。模力为亭平尝劝汉回触宿愤，通婚姻冀弥祸。福祥既定回乱，将兵入卫既又召俊募军，为之继福祥所部为甘军，俊所部号肃军，皆责饷。”⁴ 回乱平定了，平乱的清军也因为欠发军饷闹了起来。而汉人又喜欢以大话示人，或者有时候过分偏激，良莠不分。如果官员反驳，则又告官员纳贿。常年如此，聒噪于耳。陶模不是一个喜欢沽名钓誉之人，更没有种族偏见。“止别良莠，经权互用，惟冀消释祸端。”¹ 陶模劝汉、回通婚。河州的汉人均遗憾甘军先前没有狠狠地痛歼河州逆回，又以回将不如以前的旧将云云，以致诽谤的书信纷至沓来。陶模请乡绅们代为排解，以消除误会隔阂。自战乱平定后，甘军进入省城，也日渐骄横起来。

¹ 陶葆廉口述、刘永亨撰：《陶勤肃行述》，第22页。

² 陶葆廉口述、刘永亨撰：《陶勤肃行述》，第22页。

³ 陶葆廉口述、刘永亨撰：《陶勤肃行述》，第23页。

⁴ 马大正、阿拉腾奥其尔主编，《清代稀见奏牍汇编（同治、光绪、宣统朝卷）》，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10月第1版，1959页。



董福祥先前为平回乱的钦差，战后其原指望战后能够得到封疆之职，未如愿，甚为郁闷，又恐怕朝廷解除其兵权。所以董福祥也很不乐意回到其甘肃提督的任上，便推荐了他的同乡喀什噶尔提督张俊来接替其职任。清廷准了陶模裁兵节饷的奏请，陶模督府的兵员在减少，董福祥部的兵员反而在增加。光绪二十三年（1898年）春夏，董福祥练兵没有兵房，借百姓民房作兵营，百姓有苦难言。董福祥部嫌军饷过低要求加饷，这都无形中加重了督府的负担。陶模以财政困难为由，且以没有明确徵调加饷，以师出无名予以劝阻，董福祥深感不快！这年秋天，董福祥又请进京，继而调甘军进驻陕西大庆关和山西平阳府，大部分军饷仍由甘肃拨付。自此，甘肃的财政状况日渐窘迫。董福祥部的移驻，名义上是西部可以控制防止回民叛乱，东部可以防止洋人来袭。其实质均是董福祥自己的主张，并非真的要往东移驻。次年，董福祥调入京师，所部也列入武卫后军。其自誉为能够抵御洋人而自豪，但内心却很忌惮洋人。此后，董福祥又调张俊入京。张俊又新募数营，号称肃军。而所有这些，军饷皆几乎全部由陶模筹措。张俊入京后，才知道朝廷倚重的是董福祥，而非他。张俊既然回不了兰州，董福祥又推荐了一名回将“某固回翬巨擘，有功于福祥。”²董福祥向陶模吹嘘此人，日后让其抵御洋人。胜可歼灭洋人，败可歼灭回人。但据人侦知，此人不愿奉旨，且口出狂言：若调我，必须补充回队二十个营；且不受董福祥节制。董福祥明知道陶模，饷源已绝，还出此下策。陶模找来各位乡绅商议，众人皆惧怕洋人开战。若催促过急，必引起哗变。董福祥一再催促陶模，设法留住那位回将。几个月后，董福祥再次催促先前的建议，陶模也设法留住了那位回将。陶模忍着巨大压力，消除祸患于无行当中。陶模补救维持时局之苦衷，“虽在僚案，有未易共喻者几希。”³自回乱爆发以来，甘肃所花费的白金达到了六百余万两，赈济汉、回难民又花去三十余万两。稍不合例法，便遭到农部的驳斥。报销设法腾挪，左右支绌。各省的协饷一年也是一百十八万两。光绪十九年（1894年）以后，协饷便不能足额领到，财源逐渐枯竭。而且物价还日渐提升，各类浮华之事接踵而至，加之甘军东调一年就耗去八十万两，藩库中的各项正杂款项已荡然无存。陶模整日叹息，每天均念叨不得已而裁去兵员兵饷的事。陶模既没有做到节流，更没有开源的新办法。陶模说，起先若筹一百万两经费，依照过去的办法，是可以获得数千金，或万金的。像以前的开办矿业、制造既文武学堂，推广新操等各项均可以实行，而不至于像现在这样束手无措。

陶模自感统辖西北三省，东起河州、临潼，西至葱岭，广逾万里，“综揽纤筹，端绪纷还。”⁴陶模恨自己，才能太弱，难以胜任督府之责，忧劳交迫，以致其病情也在日渐加重。陶模任陕甘总督三年，“累疏乞假，两求罢斥。”⁵光绪二十五年（1900年）冬，陶模任满总督职任三年，应该赴京述职。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春，陶模进京述职觐见光绪皇帝及慈禧太后，东行登陇阪时，感受风寒，喘嗝不止，头晕、脚肿。三月，清廷赏假，着陶模到陕西西安就任医生。四月，陶模闻听义和拳起事，仰屋长叹，唏嘘不已。此时，陶模旧病未除，新病又至，不停地咯血。僚属问起他的病情，陶模一定要强做起来，论及时事，且喘且说。僚属退出后，其气不能支。关中的官员、百姓每每议论起时事，皆不信仰义和拳人数稀少。护理巡抚端方属于满清贵胄，自然不相信这些人的判断。但不论汉、满兵民相互交流却在不断地咒骂端方，端方势单力孤。陶模在每当会晤官、绅时，还往往要劝他们，要相信端方说得话。端方也会虚心和各位商议相关事务。当时署理陕甘总督的魏光焘，也时常来问询陶模有关边疆防务方面的事宜。魏光焘如遇到疑难问题，甚至回族纠纷之类的事务时，也频频发来电报缙询于陶模。有时深夜，陶模还在挑灯在帐中，代其策划事务，绝少推诿。

¹ 陶葆廉口述、刘永亨撰：《陶勤肃行述》，第24页。

² 陶葆廉口述、刘永亨撰：《陶勤肃行述》，第24页。

³ 陶葆廉口述、刘永亨撰：《陶勤肃行述》，第25页。

⁴ 陶葆廉口述、刘永亨撰：《陶勤肃行述》，第25页。

⁵ 陶葆廉口述、刘永亨撰：《陶勤肃行述》，第25页。



陶模听说，各国联军已进入京城，则忧心、惶恐无措。他嘱咐端方可请教湖北总督张之洞应对之策，或通过商人告诉各国洋人高官，都是庸官误国，与皇上无关。当时，慈禧太后也将乞和之意，通过沙俄驻新疆总领事代为转达给俄国政府。

“闰八月，调补两广总督。九月，德宗奉慈禧皇太后西幸，模迎蒲州，入见求罢不许，乃力疾上官。”¹ 此即陶模在进京途中，疾病发作，留下治疗。但到八月，陶模便接到了调补两广总督的旨意。当年9月，慈禧太后便逃到西安，陶模在蒲城迎接她们。见到慈禧太后，陶模仍要求罢斥辞官，依然没有得到恩准，反而命令他带病南下赴任。

慈禧太后之所以西逃西安，是因为这年，在北京发生了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要求清政府镇压义和团。慈禧太后原是默许义和团焚烧教堂、杀洋人的。起初是3万，后增至5万人的八国联军进京。

最终以清廷与包括八国在内的十一国签定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而告收场。《辛丑条约》是清政府赔款最多，签订国家最多，并丧失多项主权的一个条约，间接导致了清廷的衰落。

《辛丑条约》规定，清朝给帝国主义列强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全国是怨声载道，光绪皇帝不得不出面“自责”。陶模也误认为清廷自此以后能够通过“庚子国难”一定会励精图治，痛定思痛加速变革的步伐。陶模也积极提出建议，他提出：裁减宦官，禁止宦官干政，宫廷应用士人；任命官员要凭学历，不能只凭出身；要变通政治。并说：“爱国爱民要从源头上作起，朝廷应作表率，只有朝廷爱国爱民，不自私自利，才能要求官员身体力行。”²而此时，不论陶模提的建议言辞再怎么激烈、话再怎么难听，清廷都顾不了那么多了，陶模的话也是可听、可不听了。

陶模调任两广总督时已年过65岁，其患气喘、咯血疾病，身体日渐衰弱。但陶模为着清廷的安危，殚精竭虑。

九、两广任上，溘然长逝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十月中旬，陶模带着病体由儿子陶葆廉陪同，行至夏口。当时陶模的家人已由盛泽迁回到了原籍秀水（今嘉兴）居住，陶葆廉建议父亲可以先回到故里探望，再去赴任。陶模没有同意，而是取道汉口、九江直接到了广东任所。

当时清廷正在遭受八国联军的凌辱，在陶模的心目中，能为大清早一些分忧，尽力也算是尽了自己的臣子职责。广东的洋务局就设在两广总督的督府内，具体负责各种交涉事务。陶模待人忠实、诚信，对每一件涉外事宜均仔细斟酌，反复讨论。“或竟却之，不少怯懊。”³各个国家的领事也都敬佩陶模认真、勤勉的精神。

葡萄牙曾占据澳门数年，最初只是占据了澳门的半个岛屿。但自道光、咸丰年以来，他们慢慢蚕食，进而把租界推到了旧界，而与清廷也一直没有达成协议。现如今，葡萄牙人更是占据了毗邻旧界的各个乡，以及大小横琴各岛。葡萄牙人派出白朗古为葡方代表赴京城要挟清廷，又派出代表与陶模交涉。陶模咨询外务部，对葡方之要求予以坚决驳斥，但葡方代表却百般狡辩。

当时广西的边情匪患形势也甚是严峻。广西的盗匪大多得到招抚，以致盗匪充任官府的。最后竟然分不清楚，谁是盗匪，谁是将弁。陶模的办法是，尽快更换广西的主要官员，彻底整顿广西的吏治，立即更换了广西的十余名县令。对于那些冥顽不化的悍匪予以剿灭，而对于那些善良之人则予以安抚。陶模还与曾任过新疆布政使的丁振铎商议说：“发之早则祸或较小，发之迟则

¹ 马大正、阿拉腾奥其尔主编，《清代稀见奏牍汇编（同治、光绪、宣统朝卷）》，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10月第1版，1959页。

² 马大正、阿拉腾奥其尔主编，《清代稀见奏牍汇编（同治、光绪、宣统朝卷）》，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10月第1版，1959页。

³ 陶葆廉口述、刘永亨撰：《陶勤肃行述》，第27页。

祸尤巨。”¹陶模也将广西边情奏报给了清廷，怎可将“不肖文武恃边营为名利窟者”²。

广东的盗匪猖獗，历来皆由恶劣的乡绅庇护。陶模准备在全境实行清乡行动，严查盗匪，严惩劣绅。所有各军营哨弁分驻各地，归县令节制。截止月中，各地便捕斩有名盗匪二千数百人，其间也查获了纵民为乱之徒。陶模严令各城防营，对于逃入大山里的乱匪巢穴，派出大员，督率将弁，予以剿灭。治乱匪，须用重典，以保清乡之策成功。当时百姓贫穷，民心思变，仅靠杀戮也不能彻底解决乱匪问题。

陶模在各县设立了劝工厂，教养那些轻微的囚犯，即实行宽以待人之原则，力求清除盗匪。

当时广东的藩库也捉襟见肘，入不敷出。而自朝廷刚毅来粤筹饷，才发觉广东竟仅有一个富庶的虚名。“藩运二司库，久苦入部敷出”³。惠州军营各属，“闹教均贷洋债，又派认各国偿项”⁴。陶模仔细了解后得知：自光绪十九年（1894年）的甲午战争前，广东各地官府便从洋人处贷债达五百万两。这些钱到手后，大半用于赌博，另一半用于抵押再向商家称贷，既不还钱又以是洋人之债来施压。此还彼借，纯粹属于割肉医疮行为。藩库空虚，官府成了债府。陶模原本亲民、爱民，愿为国家培植元气，然而事与愿违，民困以极。拆东墙补西墙，无异于饮鸩止渴。“公收陋规理财者，唯恐博局或灭，在下者相率倾家。”⁵陶模每每念及于此，禁不住潸然泪下。官府运行没有筹款不行，国家实行新政缺钱任何事情也办不成。文武学堂虽然属于当务之急，但清廷农部又没有准销之款。靠富人募款，勉强设置起学堂。靠书院以求其利者，怨声载道。学堂师生根本不体谅学堂草创之艰难，皆语言偏激。陶模在病中，闻听学堂又人滋事，立刻揪心的吃不下饭，谓之一是自断新机。

笔者曾在广东中山图书馆曾查得陶模在两广总督任上的两条奏折，印象非常深刻。一条是陶模 1901 年 6 月 29 日（五月戊寅十四日）的奏折：“谕内阁，陶模奏，特参庸劣不职文武官员各一折，广东雷琼兵备道叶大道，嗜好甚深，怠于理事；候补知府卢秉政，才具平庸，做事苟且，均着令体致。南海县知县杨镇荣，阅历太浅，办事轻率，着开缺另补。同知衔四会县知县张经年，貌若勤能，品行卑鄙；四品衔武用通判署电白县知县蔡继昌，信任劣幕，声名平常，均着撤销加衔，以府经历县丞归部选用。候补知县曾瑞琪，性情巧滑，工于牟利，着即行革职。北海镇总兵刘邦盛，办事颡顽，措置无方；肇庆协副将斌成，才具平庸，办事踟蹰，均着开缺，选部引见。赤溪协副将张邦福，鬩茸嗜利，声名尤劣，顺德协副将刘盛濯，庸懦无能，缉捕废弛，均着即行革职。新会营参将武永泰，貌以勤干，专工应酬，着开去参将却之都司归部选用，以肃吏治而饬武致。”⁶

一条是陶模 1902 年 3 月 18 日（二月庚子初四日）的奏折，“谕内阁。陶模奏，特参庸劣不职各营官各一折。广西平乐协副将庄镇藩，办事不公，操守难信；请补宾州营参将文成榜，嗜好甚深，心术巧滑；义宁协中军都司庞熙政，年老糊涂，性复贪横；管带福军后营，广东试用知县刘运文，纵勇滋事，纪律毫无；补用游击陶梓彰，藉案勒索，几酿事端；澄海营左营守备陈子照，办事颡顽，不洽舆情。均着即行革职，以肃戎行。”⁷

这两条奏折时间前后相差不超过八个月，竟会发生这么大面积的官场塌方。陶模弹劾了一批，后面还有一批，官员的大面积贪腐已成了一种风气。

陶模在两广总督任上，主张维新，他曾派吴稚晖率领学生赴日本留学。其子陶葆廉更是以新党自居。陶模与儿子都喜欢读革命党人陈少白主编的《中国日报》，且与留日革命党人沈翔云交

¹ 陶葆廉口述、刘永亨撰：《陶勤肃行述》，第 27 页。

² 陶葆廉口述、刘永亨撰：《陶勤肃行述》，第 27 页。

³ 陶葆廉口述、刘永亨撰：《陶勤肃行述》，第 28 页。

⁴ 陶葆廉口述、刘永亨撰：《陶勤肃行述》，第 28 页。

⁵ 陶葆廉口述、刘永亨撰：《陶勤肃行述》，第 28 页。

⁶ 广东省地方志编委会、广州市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清实录广东史料全六册》（卷 483 页 379-380），第 403 页。

⁷ 广东省地方志编委会、广州市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清实录广东史料全六册》（卷 483 页 379-380），第 409 页。



往密切，很受陶模的影响。

陶模在广东安定社会秩序，推行开明措施，他屡次向清政府上疏请求裁减宦官，认为“变通政治宜务本源，本源在朝廷，必朝廷实能爱国爱民，乃能以爱国爱民责百官；必朝廷先无自私自利，乃能以不自私自利望天下。转移之道，一曰去畛域，一曰务远大。朝廷当以身作则，克己胜私，否则虽日言变通，无由或变通之效。”¹作为两广总督的陶模说的都是别的官员不敢说的话，的确也是切中清廷政治腐败的要害。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陶模在两广总督任内再次疏奏“开办武备学校废除科举……”²。清政府觉得陶模喋喋不休非常讨厌，将其奏章退了回来，分明表示所奏不准。

署理两广总督德寿发现陶模没有发出的奏章，内有：“（粤东）实已民贫财尽，而迫于时势仍不能千方百计筹款，老百姓贫困已极，盗贼纷起，常此下去后患可虑……夏旱之后又遭水灾，若再办理（筹款）更为棘手。”³从这些疏奏中尚能看到他对国家时局的忧虑心情。

在陶模的最后时刻，妻子许华美前来广州探望其病情。其间陶模也说了其回去的打算。陶模说，自己已没有精力再继续自己的职责了。陶模对儿子陶葆廉说：“余负国、负民，有死而已”⁴。陶模交代儿子陶葆廉，尽快为他准备后事。依照祖父、祖母丧事的定例。陶模也要求自己的丧事一定要节俭，制棺也未超过百金。陶葆廉一切皆遵照父亲的意愿做着准备。陶模夫人回去时，正值春年。陶模在写给亲友的信函中也一再引用古人祈求死亡的话语。后来，陶模已不喜欢吃医药了，经陶葆廉恳求数次，则说：“姑徇尔请，延医至，则曰：何犹不得死。”然后一吃药，即洒出一半；饮食也大减，夜不能寐，就这么与儿子陶葆廉对坐着；或晚上批阅文牍。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六月初二日，陶模“奉准开缺之旨，即又命俟李署抚到后再行交卸”⁵。七月中旬，陶模吐血骤然加剧，连续不止，竟呕吐出一片肺叶。九月初九日子刻，溘然长逝。享年68岁。

1902年7月3日（五月丁亥（二十八日）“两广总督陶模因病解职，以广东巡抚德寿署两广总督，调山西巡抚岑春煊为广东巡抚。”⁶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初三日，清廷加恩追赠陶模，太子少保衔，谥号：勤肃。

一直随侍父亲身边的陶葆廉追忆说，父亲生性清净淡泊，没有很好的衣装，也没有书、画，收藏等喜好。平常均十分朴素。“一铜盥具绝小，数十年不易。一牙章钤用刑弊，亦数十年不易”⁷。陶模刚到陕甘任职时，陶葆廉曾想请父亲“纳筵室，以资侍奉，倩戚又从容言之不许。又请召家乡庖人来，亦不许。食常一二谷、一咸鸭蛋，不能尽，必令剖、半以进”⁸。陶模生活极其简朴，即使是过生日时，也全部是素食。“抚新四年，从未坐轿。于是司道以下皆舍轿。初至粤督署，电灯遍耀堂室，问民间能通用否，司其事者曰：机小、力足。府君曰：岁耗万金，止照一署。奚为哉，命撤去。”⁹

曾任新疆布政使，已经五十二岁的王树楠闻听陶模故去，在自己的年谱中还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六月两广总督陶勤肃公模卒。模字子方，某科进士，由州县起家，历官至总督，数十年未尝携眷至署，其廉正为天下第一。余有送公赴两广诗序，莅任三年，以病连疏请开缺，寻卒。余

¹ 马大正 阿拉腾奥其尔主编《清代稀见奏牍汇编（同治、光绪、宣统朝卷）》，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10月第1版，1959页。

² 广东省地方志编委会、广州市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清实录广东史料全六册》，第411页。

³ 广东省地方志编委会、广州市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清实录广东史料全六册》，第411页。

⁴ 陶葆廉口述、刘永亨撰：《陶勤肃行述》，第29页。

⁵ 陶葆廉口述、刘永亨撰：《陶勤肃行述》，第29页。

⁶ 广东省地方志编委会、广州市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清实录广东史料全六册》（卷500页610），第411页。

⁷ 陶葆廉口述、刘永亨撰：《陶勤肃行述》，第35页。

⁸ 陶葆廉口述、刘永亨撰：《陶勤肃行述》，第35页。

⁹ 陶葆廉口述、刘永亨撰：《陶勤肃行述》，第35页。



之第一知己上司也。余以‘陶庐’名斋，陶即指公言。”¹王树楠说，陶模为官数十年，从来没有携带家眷到任所，他的廉政堪称天下第一。他将陶模视为自己第一个知己上司。晚年的王树楠，自命为陶庐老人，陶就是指陶模，可见他对陶模的敬仰之情。

十、返回故地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九月九日，陶模病逝后，灵柩归葬于浙江嘉兴郊区荷花乡顾店桥。历经“文革”的破坏，陶模的墓碑早已荡然无存。

陶模生前著有《陶勤肃公奏议》12卷、《养树山房遗稿》2卷。

在甘肃的兰州、文县都曾建有陶模的祠堂，后遭焚毁。光绪卅年（1904年），新疆巡抚潘效苏根据百姓要求，经清政府批准，由群众出资建纪念祠堂，祠堂建在迪化北门现儿童医院址，与金顺的祠堂挨在一起。1931年后，金树仁统治新疆时期，此祠及祠南金顺祠堂经省政府秘书长陶明樾提出金树仁批准，用作为医治伤兵临时医院。盛世才统治时在此祠堂处建苏式二层门诊楼一处，称“北门医院”。此祠堂，在1949年后曾是北门医院的病房，直到1976年因基建的需要，才将陶模及伊犁将军金顺祠堂连同“北门医院”那幢门诊楼一并拆除，扩建成了今天的北门儿童医院。自此，陶公祠仅剩的一块方石还存在医院院内，永远作为后代人们的奠基石了。

十一、陶氏遗产

作为陶模生命和精神的延续，他一个儿子早卒，另一个儿子陶葆廉（1862-1938）非常的有成就，有乃父之风，别署“淡安居士”。他少年入学，为优贡生，秉性俭约，好学不倦，博览群书，专心撰著，对史地考证、医学、算术，都颇有研究，倾向于维新，1902年代理浙江大学堂总理。1909年，陶葆廉被召入内阁，授予陆军部军机侍郎中。后来他寓居上海，热心嘉兴地方公益事业。1914年浙江通志局成立，被聘为分纂。1919年11月，曾奉命会办苏浙太湖水利工程。1921年10月19日，在上海致电北洋政府内务部、财政部，汇报浙江嘉兴、平湖、海盐、嘉善、桐乡、海宁迭遭飓风和水灾的情形，要求救济灾民。²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避居桐乡。1938年秋，陶葆廉因愤疾交加去世。

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陶模任新疆巡抚，葆廉随父赴新疆。沿途逾长城、渡瀚海，经古代蒲类（今巴里坤）、车师（今吐鲁番）等地，行程11200余里抵乌鲁木齐。陶葆廉曾与陈三立、谭嗣同、沈雁潭并称为“晚清四公子”。陶葆廉曾以日记方式记述途中所见所闻，著成《辛卯侍行记》。

时任新疆布政使的丁振铎，在给陶葆廉的《辛卯侍行纪》序言中写道：“盖侍其尊公由陕藩简授新疆巡抚，自入觐以泊履任，备记程途日月，酬应往来。英荡式临，负弩矢者骈集。檐帷暂住，拥冠盖以鳞差。而君随侍其间亦几忘风尘况瘁，天伦之乐，际遇之荣，有昔人所未逮者。”³很显然，在陶模担任甘肃新疆巡抚的时候，他与陶模父子皆交往甚密，不然他也不会自谦以弟的名义给陶葆廉写序了。

¹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王树楠撰，《陶庐老人随年录》，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6月第1版，第45页。

² 林志宏著：《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中华书局，2013年6月北京第1版，第433页。

³ 陶葆廉著（西北行纪丛书）《辛卯侍行纪》，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419页。

